

上海六千年

千年之城

QIAN NIAN ZHI CHENG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 主编
仲富兰 / 著

漫漫历史长河，上海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6000年，有记载的“上海”一词出现近1000年，上海建城已700多年。沧桑巨变，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铭记历史，共同建设家园，传承文明。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地方志普及读本系列

上海六千年

朱家



千年之城

QIAN NIAN ZHI CHENG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 主编
仲富兰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六千年. 千年之城 /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编;
仲富兰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上海地方志普及读本系列)

ISBN 978-7-208-15324-0

I. ①上… II. ①上… ②仲… III. ①上海-地方志-通俗读物 IV. ①K295.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2849号

本书由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资助



SE|D|F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

SHANGHAI EDUCATIO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目 录

一、概述 / 001

二、市镇雏形 / 031

1. “上海浦”与“下海浦” / 032
2. 浦边聚落知多少 / 036
3. “踏曲爨蒸”说酿酒 / 040
4. 千年酤道“上海务” / 044
5. 从“上海务”到“上海镇” / 049

三、港口迁移 / 055

6. 上海衙署的变迁 / 056
7. 嘉定与州桥故事 / 061
8. 从青龙港出发 / 066
9. 浏河、江湾与上海港崛起 / 070
10. 前赴后继的治水专家 / 075

四、海道风骨 / 081

11. 改写中国漕运史的两个上海人 / 082
12. 纺织先驱黄道婆 / 086
13. “帆樯比栉”与沙船出海 / 090
14. 顺济庙里祭妈祖 / 095
15. 骨子里的冒险性格 / 099

五、市镇兴起 / 105

16. “一城烟火半东南” / 106
17. “金罗店，银南翔，铁大场” / 111
18. “多少龙华七宝尖” / 117
19. “三泾不如一角” / 120
20. “百家烟火傍朱泾” / 125

六、万商云集 / 131

21. 上海县：小城大市面 / 132
22. 城墙与城门：从设立到拆毁 / 138
23. 船商富甲引领商帮勃兴 / 143
24. “牙行”交易 / 148
25. 开放与商业辐射力 / 152

七、城市信仰 / 157

26. “霸王潮”与“汉将功臣庙” / 158
27. “闹猛”与“猛将庙”祭祀 / 162
28. “察司庙”与“太仆祠” / 167
29. 从“民间”到“国家”的城隍信仰 / 171

30. 城市信仰与生命信仰 / 176

八、市政格局 / 183

31. 一城三治格局形成 / 184
32. 越界筑路与“洋泾浜”变迁 / 189
33. 华洋杂居的城市景观 / 193
34. 西人生活的示范效应 / 197
35. “大上海”计划始末 / 201

九、都会空间 / 207

36. “公园”出现上海滩 / 208
37. “乃文乃武，唯精唯一” / 213
38. 娱乐休闲场所“蝶变” / 218
39. 大世界与娱乐业变革 / 223
40. 文博场馆开门迎客 / 227

十、新知沓来 / 233

41. 西方人文思潮袭来 / 234
42. 墨海书馆与广学会 / 238
43. 开风气之先的书局与报馆 / 242
44. 书院向新式教育迈进 / 247
45. 张园与新公共空间肇建 / 252

十一、红日破晓 / 257

46. 《新青年》横空出世 / 258
47. 品尝“真理的味道” / 262

- 48.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 267
- 49. 南京路上擦不去的“街血” / 271
- 50. 东方图书馆的红色记忆 / 276

十二、风俗嬗变 / 283

- 51. “赶时髦”：服饰求新趋时 / 284
- 52. “吃得开”：饮食开放流畅 / 289
- 53. “石库门”：住宅中西合璧 / 295
- 54. “快节奏”：百年城市交通 / 299
- 55. “德律风”：通讯迅疾发展 / 303

附录：大事记（1074—1949年） / 309



概述

在上册《远古文明》中，我们依据各种考古材料、历史材料以及民间文化资料，分析了上海的远古文明，说明上海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文化名城。那么，上海的建城史从哪儿算起呢？现在一般的说法是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经元朝廷批准，上海辖华亭县东北的高昌、长人、北亭、海隅、新江5乡，正式设县。这是上海以“上海”之名建县的行政开端，就今日上海地区而言，要说建县，唐天宝十载（751年）上海就建立了华亭县，县治即今松江，这是今上海地区出现的第一个县级行政建置。

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统辖华亭县的松江知府仆散翰文以“华亭地大民众难治”为由，奏请元朝中央政府分设上海县。翌年即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具体日期为公历8月19日），元朝中央政府批准，划出华亭县东北，黄浦江两岸的长人、高昌、北亭、新江、海隅5乡26保设立上海县。而首任主簿于元至元二十九年才到任。据此，谭其骧教授等专家认为上海建县应以

元廷批准设上海县的至元二十八年为准。新编《上海县志》中则把“松江府奏请设县”“元廷批准立县”“主簿到任”三个年份都如实载录，从而留下了可信的史实。我们就以元至元二十八年上海设县，在“上海县”出现的一个很长时间内，一直存在着“上海镇”，上海得名于一条叫上海浦的小河，它是吴淞江的一条支流。据《宋会要辑稿·食货·酒曲杂录》记载，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前后设立榷酒机构“上海务”（管理贸易和税收的机构），上海务是上海镇的前身，正是因为“上海务”，才为几十年后的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上海正式立镇打下了基础。而上海镇应该是上海建城史的开端。

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它与历史行政区划的划分并不是一回事。中国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征是：（1）城市所处位置大都是交通便利之处，成为商品市场和贸易中心，农产品的集散地；（2）手工业匠人在城市的专业化和集中化趋势不断增强，城市对乡村和周围地区的影响逐渐扩大，成为手工业生产的集中地；（3）城市的规模主要取决于其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对外吸引能力；（4）城市消费规模超过生产规模，城市的消费主要靠农村的地租和税赋来支撑，这时，城乡关系是对立的。古代城市的这些特征使城市功能逐步多样化，一些城市管理问题也开始突出，相应的法律条文也开始产生。

关于“上海镇”，史学界历来存在争议，由于史料的极度匮乏，甚至有人怀疑上海曾经设立过“镇”，学

者周敏法先生在高行镇曹家老宅的一本《平阳曹氏族谱》中读到“沪渎曹氏……因宋室多故，而迁居蹕临安，族从而徙者，凡十有余人，遵而家于上海镇（熙宁七年置上海镇于华亭）者，则济阳之裔也”。这个发现，一时轰动史学界，这段文字印证了清代《嘉庆上海县志》“熙宁七年”（1074年）设置上海镇，也印证了清代乾隆年间褚华撰《沪城备考》“宋神宗熙宁七年立镇”的记载。秦荣光《同治上海县志札记》曰：“宋熙宁七年，於华亭海设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为上海镇。”这段南宋进士谢国光写于宋末的记载直接注明上海镇建于北宋熙宁七年，从而把上海建镇的“熙宁七年说”给坐实了，使上海建镇历史可以追溯到近1000年之久。

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纂成的《云间志》记载：“上海浦。在县东北九十里。”《云间志》以华亭县为中心，就在今天的松江城厢镇，上海浦在华亭县治东北九十里，大致上就在今天的上海市中心城区。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前，在华亭县的东北方，已经有一个名叫“上海”的大聚落，朝廷官府在此设立酒务，名叫“上海务”，管理附近地区的酒类买卖和酒税。这条史料也见于《宋会要辑稿》。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上海”这个名字，最迟在北宋熙宁时就已经出现，北宋“上海务”虽然还不是行政建置，而是一个以“榷酒”为主的税务机构，但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上海正式建镇，就开始了上海城市的肇建史。本册“千年之城”说的就是从上海镇设立以后的城市发展与演化的历程。

上海浦是吴淞江支流，为什么北宋朝廷要在此设立“榷酒”的“上海务”？因为上海地处江南，主要农作物是稻米，而酒原本是稻米的精华。大约生活在南宋理宗时期的一位扬州人张蕴，客居在上海浦边，他曾经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上海》：“梦醒三更鹤，芦边系短裙。听潮看海月，坐石受天风。物至秋而化，年来我亦翁。长歌相劳事，犹喜此樽同。”《南宋六十家集》收录了他的《斗野稿支卷》，其中也包含《上海》诗一首，这首较早以“上海”地方为题的诗歌，给我们描写了这样的场景：半夜三更，诗人被鹤唳惊醒，系着短裙独自来到江边，遥望天上的一轮明月，倾听江水波涛拍岸声响，万物到秋天成熟，诗人不免发出“年来我亦翁”，岁月流逝，老之将至的感叹，天晚来风，触景生情，人生苦短，烦劳纷杂，还是对酒当歌，可至永远。

张蕴的这首《上海》诗，是不是当年的“饮酒歌”并不重要，但这首诗唱出了“酒”与“上海”的心声，“上海”与“酒”就那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明朝有一个叫何良俊的上海人，他在《四友斋丛说·卷十四》的著述中写道：“青龙自唐宋以来，是东南重镇也。相传有亭桥六座。亦通海舶，由白鹤江导吴淞出海。宋时设水监于此，盖以治水利兼领海舶也。宋时卖官酒，酒务亦在此，江南所卖官酒，皆于此制造。入我朝来，水道湮塞，而此地遂为斥卤矣。”这个记载说明，“青龙务”与“上海务”一样，都是北宋秀州17个酒务之一，到了南宋末年，“青龙务”随着青龙镇的衰落，也逐渐式微，代之而起的“上海务”却如日中天。

元末大学问家陶宗仪（1329—约1412年），字九成，号南村，他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工诗文，善书画，成语“积叶成书”就是讲述他的故事。元末兵起，陶宗仪避乱松江华亭，耕作之余，随手札记。元至正末，由其门生加以整理，得其中精萃580余条，分类汇编成《辍耕录》（或称《南村辍耕录》）三十卷，该书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都很高。《南村辍耕录》中收录了当时人写的《行香子》词，十分有趣：“浙右华亭，物价廉平，一道会买过三斤。打开瓶后，滑辣光馨，教君霎时饮，霎时醉，霎时醒。听得渊明说与刘伶者，一瓶足足三斤。君如不信，把秤来称。”这首词说的也是时人街市酤酒的轶事。

把这些零散的材料串联起来，可见“上海务”以及那个时候上海的酤酒与酒肆是很兴旺的。从“上海务”出现后的几十年中，上海镇也正式建立。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有上海酒务设方浜畔征收酒税，这个时候上海镇已经设立3年多了，朝廷派出机构的“秀洲十七务”之一“上海务”依然存在。明弘治《上海志》记载，宋度宗咸淳年间，一个名叫董楷的人，做过上海镇的“监镇”，董楷曾经撰写了《受福亭记》和《古修堂记》两份文献。《受福亭记》一开头就说：“咸淳五年八月，（董）楷忝命舶司既逾二载。”《古修堂记》中又说：“……前分司缪君相之作两庑、作门庐、作灵星门。”董楷在宋代上海市舶分司供职的记载表明，上海港船舶辐辏，番商云集，成“华亭东西一巨镇”，地处“海之上洋”，滨上海浦，在上海镇的管辖范围之内。

上海镇的设立不会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它的设立，必定有一个孕育与成长的过程。“上海务”，是秀州（浙江嘉兴）地区17个“酒务”之一，起初地位还不如华亭、青龙、大盈等务，但因紧靠上海浦，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很快在经济总量上超越其他“务”，名列前茅，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上海已是“华亭县东北一巨镇”。上海务得名于上海浦，也是日后“上海镇”的前身。由此可以推定，上海浦边的“上海务”就是上海镇发端的滥觞，从熙宁七年设立的上海镇，上海这座城市已经走过将近千年的岁月风尘，这就是我们所说“千年之城”的历史依凭。

宋元时期，是上海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通志馆一批以上海本土作为研究对象的先贤，就注意到宋高宗南渡与上海文化发展的关系，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大批移民的涌入。

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所载，北宋开宝九年（976年）全国的户数为3 090 504户，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为10 684 435户，400年中人口增长了2.45倍，同期上海的人口是多少呢？据方志专家许洪新先生计算：“上海地区人口总量在北宋大中祥符间约48.6万，元代至元二十七年约218万，明洪武二十四年约280.2万”，从北宋到明初的不到400年的时间里，上海地区人口增长了近5倍，远远高于全国同期的人口增长率。大量移民的迁入，是上海地区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移民大量涌入，人口来源空前广泛，主要是因为自

东汉末建安南迁、两晋间永嘉之乱至唐代安史之乱，中原每有战乱，上海地区就有较多的人口迁入。北宋王朝由盛而衰，在这个历史时期，虽有和平间歇，但从中原到华南，总体上是烽火遍地，战乱频仍，女真、蒙古二下江南，逐宋室于东南滨海；红巾起义群雄逐鹿，混战于河汉江淮。战乱震荡着社会生活环境，而相对安定的上海地区却成了避乱者的天堂，形成了一而再、再而三的人口涌入高峰，其中还有一部分少数民族，先后在青浦、南汇、上海、嘉定、七宝等地落籍定居。

人口大量迁入上海，它的直接作用是有力地推动了上海地区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上海地区的经济开发。首先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宋代之前，上海地区农业已有相当基础，尤其是吴越王钱镠，注力水利，开浦凿塘，《十国春秋·吴越世家》上说“营田卒数千人，以淞江辟土而耕”，“募民垦殖”，“勿取其税，由是境内无弃田”。宋元时代的移民，带来了各地的农业生产工具、技术和农作物，辟建大量的居民点，开垦了大量的耕地。农田的开垦和农作物分布的变化，元末明初诗人袁凯《沙涂行》诗云：“西起吴江东海浦，茫茫沙涂皆沃土；当时此产不归官，尽养此地饥民户。”正佐证了当时耕地垦殖的情况。

宋元时代上海地区出现了三大新农作物——占城稻、小麦和棉花，占城稻是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由宋代官府朝廷下令推广的，麦和棉花则是移民的贡献。《吴郡图经续记》载：“吴中地沃而物伙，……其稼则刈麦种禾，一岁再熟”，而苏轼在《乞赈济浙西七州》折中称“两浙水乡种麦绝少”，可见

北宋末年吴郡已有小麦的种植，但并不普遍；建炎（1127—1130年）之后，江浙之地“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1131—1162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显然，上海地区大量种麦是北方移民推动的，而种麦形成的两熟制，无疑是上海地区农业发展的一大变革。说到棉花，明正德《松江府志》称棉花是“宋时乡人始传其种于乌泥泾镇”。植棉以及棉纺织技术传入，在上海经济中具有划时代意义。元元贞年间（1295—1297年），乌泥泾人黄道婆从海南带回捍、弹、纺、织之具，改革纺织工具和技术，教习乡亲“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织成美观实用的番布，推动棉花生产和江南棉纺织手工业发展，促进江南经济。当时，乌泥泾镇地理位置距离上海镇不远，也是海运、漕运之交通枢纽，商贾水手云集，是闽广移民进入上海的主要门户。棉花的传入，是上海经济发展的重大转折，此后数百年，上海“衣被天下”，能以纺织中心出现于全国，移民功不可没。

大量移民的迁入，更促进了上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移民对上海盐业的发展也有很大推动。上海地区盐业发展很早，自吴越至北宋已逐步成为一大经济支柱。南宋小朝廷为财政计更着力经营盐业，南宋建炎年间，南起今金山、柘林，北至吴淞江口沿海，设浦东、袁部、青村、下沙、南跄，以及崇明天赐场6个盐场，各盐场设基本生产单位团、灶。宋景定元年（1260年），年产食盐2500万斤，元至正（1341—1370年）初年增至3000万斤。